

## ☆民族学与人类学应用研究

## 军事民族学基本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赵野春\*

**摘 要:** 军事民族学,是指以实现军事目标为目的,在军事活动中用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认识和解释活动区域内他者文化群体及相关现象,并将其成果运用于军事活动全过程的学科门类。但学术界对其重视不够,认识不深,建设不足。本文从民族学与军事活动的联系、军事活动的民族学实践、军事活动的民族学要素、基于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范畴等方面进行尝试性探讨。

**关键词:** 军事活动; 民族学; 学科建设

综观民族学研究史的悠长路径及斑斓景色,人们或许发现一个问题,它与军事学或军事行动研究间,似乎反映出一种学科的漠然或回避,没有更直接的关注或关照,彼此是有隔膜的、陌生的。就客观历史存在而言,军事活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人类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近代以来,民族学也曾广泛地或深刻地影响过军事行动。可以说,民族学的很多材料来自于军事行动,它的很多成果也惠及了军事行动。换句话说,民族学和军事学有很多亲缘关系,彼此间又有交叉部分。以这种交叉部分为基础,构建一个边缘学科应该是可能的。如果用军事民族学名之,也是可选的。如此推之,民族学学科体系下,有诸如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政治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生态民族学等分支,也应该有军事民族学。这样或许更有利于促进学科体系的完善和丰富。我们认为,军事民族学,就是指以实现军事目标为目的,在军事活动中用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认识和解释活动区域内他者文化群体及相关现象,并将其成果运用于军事活动全过程的学科门类。

## 一、民族学与军事活动的联系

一般而言,民族学是指对他者文化的所有知识加以体系化构建与应用的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民族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对他者文化的描述上来。正是在他者文化的描述中,逐渐对不同文化体加以甄别、梳理和吸纳,于是民族学产生了。杨圣敏、胡鸿保等学者认为:“民族学(Ethnology)又称‘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19世纪中叶产生于西方。”<sup>①</sup>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对诸民族或种族文化的比较研究,称之为民族学;对诸民族或种族文化的记述和分野,被称之为民族志。<sup>②</sup>在我们看来,围绕诸民族或种族文化所展开的研究及应用,都是有理由归结为民族学范畴的。

西方的早期,如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古罗马的塔西佗等,就对不同人群予以了记录。但今天人们所认知的民族学,出现于西方殖民过程之中。“西方在近代开展殖民活动当中,发现了世界上各地区各种人群,一些人开始对其进行记录、研究,进行解释,出现了一些早期的作品……”“到19世纪,世界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基本建立起来之后,西方在海外进行殖民统治和管理,这种单靠个别人兴趣

\* 赵野春,武警警官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教授。

① 杨圣敏、胡鸿保:《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② 刘其伟:《文化人类学》,百花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进行的研究就不够了;需要专门的学问来进行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这就是民族学、人类学产生的社会需要”<sup>①</sup>。以至功能学派创始者诸如布朗会说:“许久以来,人类学家即呼号应用此种科学于实际殖民地治理之需要。关于英国,人类学之实际应用已有相当步骤,政府对各殖民地皆派有人类学专家佐理殖民地行政,并训练殖民地服务人员……”他还说:“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地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之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有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sup>②</sup>因此,在西方,民族学的发生,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的需要。

与此同时,当西方殖民者开着炮舰跨洋过海抵达或者准备抵达他者文化区域时,迫切需要了解 and 掌握目标区域的文化信息,也就是军事学里的所谓情报。因此,在这里,民族学研究是以军事行动为目的的。西方早期民族学著述的材料的一部分也来自于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军人。曾几何时,充当西方殖民者入侵先锋的传教士,留下的很多民族学著述或材料,均为西方殖民者实施殖民过程的军事活动所利用。直到现在,美国等国军队在亚洲的军事行动,还十分注意运用民族学研究成果。例如,驻阿富汗美军的行动手册里,就有大量的民族学方面的内容。这种行动手册里,列举了诸如当地族群习惯、宗教习俗、历史传统等方面的知识与规定。在著称于世的美国西点军校,人类学课程是所有学员的必修课。

就多民族国家来说,似乎也需要通过对他者文化进行研究,以确立国家政权对他者地域的治理与建设。这是由他者文化自身特殊性、差异性所决定的。而他者文化的存在的理由,恰恰是这种特殊性、差异性。他者文化等同于特殊性、差异性。以他者文化研究为己任的民族学,自然需要高度关注他者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首先是为对他者的理解以获取相关资讯,其次是通过对他者文化的认识而制订相关对策,最后才是挖掘和发展他者文化以丰富人类文化。当今而言,民族学或许已经到了丰富人类文化的阶段。但绝非说可以完全忽视第一、第二阶段了。对他者文化全方位关注,始终是民族学的最大义务和责任。就其历史来看,“在第一阶段的从西到东当中,西方的文化在殖民扩张中,伴随着经济上的商品、军事上的军队,到达了其想要占领的地方,来推广西方的价值,来为占领地的管理服务”<sup>③</sup>。这一事实让人不能不说,人类学或民族学带有明显的军事活动痕迹。

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指出:“由于人类不同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同样的一件事情、一句话,会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引起不同的反应,甚至会出现倾向相反的反应。”<sup>④</sup>民族学学科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对他者地域渗透或拓展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等东方国家,人们对他者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往往从开疆拓土开始,伴随着治理或管辖他者文化地域使其纳为臣民的全过程,甚至在其融入我者之后,仍予以注意。对于后者,诸如汉族的区域文化,就是如此。当今东北文化、川系文化、粤系文化、淮系文化等,都有这样的痕迹。而在现今中国的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全过程,无不需要体现对他者文化特殊性、差异性认识和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当使用军事力量维护社会稳定时也需要民族学关照的直接原因。当然,在更早时期,中央政府统治触角向他者文化区域的延伸,很多时候均伴有军事活动。所以,最早的民族学研究,很多内容就发生在军事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当他者文化融入我者后,民族研究与军事活动的联系,才最后割断。

当然,民族学发展至今,或许在其身上的军事色彩已经褪去,有的甚至很不情愿与军事活动相提并论。对今天的大多数民族学研究者而言,或许离军事活动已越来越远。不过,作为一个应该关注的领域,所有民族学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军事活动与民族学的联系。否则,自己的民族学研究难道没有缺憾吗?尽管西方殖民活动中,曾将民族学用作侵略的工具,使其成为侵略者的帮凶。但应看到,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民族学也为弱小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① 孟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6页。

② 孟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③ 孟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史(1900—1949)》,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2页。

④ 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放民族地区的伟大斗争中,民族学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驻民族地区包括边疆地区部队,所有军事活动都是基于对民族学研究成果的理解和吸收,同时这些活动也是民族学研究所不能忽视的重要材料。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民族学与军事活动的天然联系,也证明了军事活动对民族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 二、军事活动的民族学实践

民族学理论体系是基于西方社会视角而形成的。而西方军事著作之中,莫不看到历史上的诸多军事行动孕育有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因子。据公元4世纪下半叶古罗马的韦格蒂乌斯所撰写的《兵法简述》,依据古文献记载,对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进行了分析:“雅典人不仅精于武事,而且在他各种技艺方面也都业绩辉煌;斯巴达人(拉西第梦人)则仅限于对战争的倍加关注。”<sup>①</sup>这是西方古代军事理论家论述军事活动时的所持民族学视角的一种体现。他记述道:汉尼拔在准备进攻意大利时,特地找了一位拉西第梦人做高参。<sup>②</sup>拉西第梦人熟悉和了解意大利人。他又与敌人战斗要熟悉其习惯<sup>③</sup>,“了解敌军的统帅是怎样的人,了解他身边的随从和高级指挥人员的情况”,并掌握他们的特点。<sup>④</sup>韦格蒂乌斯甚至说:“聪明的将帅善于在敌人之间制造纷争。任何一个民族,哪怕是很小的民族,只要内部不发生自相残杀,是不会被敌人灭尽的。”<sup>⑤</sup>在论述训练新兵时,他说:“任何地方,人都有懒惰和勤奋之分。不过,某些种族的人在武事方面要强于其他种族,而且不同的天穹之下的气候条件对于人的体力和精神力量颇大。”他认为热带的人害怕白刃格斗,寒地的人则热衷厮杀。<sup>⑥</sup>这也应是民族学研究的佐证。

到公元15世纪下半期16世纪上半期,意大利的军事理论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著《兵法》(或译为《战争艺术》),关于军事活动的论述有很多民族学的观点。例如,论及国家遴选士兵时指出:“出生在气候炎热的国家里的人比较理智,但不够勇敢;寒冷地区的人则勇气有余,理智不足。”<sup>⑦</sup>帕提亚人总是在马背上作战,战斗中他们黑压压一片从四面八方扑向敌人。<sup>⑧</sup>亚洲之所以人才稀少,因为整个帝国只隶属皇帝一人。<sup>⑨</sup>马基雅维利的军事观点里,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学知识。19世纪上半叶,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指出:“民族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之间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由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sup>⑩</sup>他还说:“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军事活动就越能在该民族中占据支配地位……尚武精神在野蛮好战的民族身上远比在文明民族中普遍……文明民族当然也会有好战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越强,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人就越多,在这类民族中普遍的尚武精神和较高的智力能够相互结合,所以最辉煌的战绩就会在那里出现。”<sup>⑪</sup>而“军队的民族精神,包括军人的热情、狂热、信仰和信念等”<sup>⑫</sup>。在克氏看来,军事活动与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相互联系的。

理论上,在特定条件下,军事干涉对解决民族问题有着特殊的作用。军事干涉增强了干涉者对被

① [古罗马] 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兵法简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6页。

② [古罗马] 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兵法简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7页。

③ [古罗马] 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兵法简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2页。

④ [古罗马] 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兵法简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9页。

⑤ [古罗马] 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兵法简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3页。

⑥ [古罗马] 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兵法简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7~38页。

⑦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兵法》,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页。

⑧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兵法》,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4页。

⑨ [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兵法》,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2页。

⑩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⑪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⑫ [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干涉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而改变了一定范围的地缘政治结构。<sup>①</sup>这种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也应该有民族结构的演变。而暴力性民族冲突、民族问题国际化以及国际组织干预民族冲突问题,在后冷战时期,已成为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的新领域。这使军事干预在国际上成为与民族学有紧密联系的军事活动。李聪在论述欧盟干预科索沃民族冲突时指出:“正是由于欧盟对于科索沃问题的民族性因素的关注,特别是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民族性偏好,使得科索沃地区的族际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提高了当地各民族对于国际组织的认同,从总体上维护了当地脆弱的社会秩序,改善了科索沃的国际形象。”<sup>②</sup>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军事活动有利于构建多民族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军事干预是值得民族学研究的。据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曾国藩手下大将胡林翼见到外国军舰时当即昏厥过去,事后告诉他人:对付太平军还有把握,对付外国军舰就没有办法了。<sup>③</sup>这种例子,恰好说明落后的晚清时期的军人民族学知识的匮乏。而清乾隆皇帝启用贵州总督兼巡抚事张广泗攻打四川金川的理由是:其熟悉苗情,善于抚驭,“大抵番蛮与苗性相近,今荏川省,即以治苗之法治蛮,自能服其心,消弭其衅……”<sup>④</sup>又使人看到乾隆皇帝是知道民族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应该具备民族学知识的。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有了多门多派的特征,学科水平不断得以提升。尽管其早期以关照西方殖民活动为起点,并直接服务于侵略者的军事活动,但在其学科成熟后则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学术性风貌,有意无意地淡化自身的军事活动色彩。但作为学科,中国民族学展现了空前的活跃与勃勃的生机,特别是民族学与军事活动的结缘或嫁接显得十分突出。例如,抗日战争的后方,林耀华、李安宅、李有义等从社会学研究转入对少数民族研究,注重少数民族调查。1950年,民族学家李安宅、于式玉等加入第十八军进藏及组建第十八军的民族研究所等历史实践,已充分显示了这门科学对军事活动的巨大意义。李安宅早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和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深造,对印第安人祖尼部落的调查报告,引起美国学界轰动。1941年,应聘到成都华西协成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既精通英、印、印尼、藏、汉语,又是藏族人的谢国安教授,63岁,与李安宅、任乃强很熟悉,也随十八军进藏,担任进藏部队翻译工作。任乃强,研究西南,特别是康藏的历史和现状,实地考察康边藏区,坚持史、地结合,综合研究,向贺龙提供详细的西藏地图,为西藏解放做出贡献。杨圣敏、胡鸿保主编的《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中写道:“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著名的民族学家也积极地加入了少数民族的解放工作”,如谷苞教授(当时在兰州大学任教)随解放军进入新疆,林耀华、宋蜀华、王晓义等人也随军进藏,参与新疆、西藏的解放工作。<sup>⑤</sup>

不仅如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学就被成功地运用于军事活动,最典型的是“彝海结盟”、贺龙等与藏族喇嘛修好。1935年5月22日,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按照彝族习俗,与彝族果基家支小叶丹叔侄,在冕宁县的彝海湖畔,同饮鸡血酒,对天盟誓,结为兄弟,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和一些步枪送给了小叶丹,小叶丹也将自己的坐骑送给刘伯承作为纪念,化解了误会,在小叶丹的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争取了宝贵的三天时间,抢在蒋介石前头渡过大渡河。<sup>⑥</sup>这是刘伯承基于“他过去曾经到过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又比较熟”<sup>⑦</sup>,懂得彝族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熟悉彝人讲信用的文化。后来,聂荣臻元帅回忆说,红军到后,释放了所有被国民党军当成人质的彝族头人,还“请这些头头们喝了酒”<sup>⑧</sup>,就得到了他们的信任。1936年5月,红二、六军团奉命穿越辽阔的藏民区,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部队

① 徐蓉冷:《战后军事干涉的理论分析》,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② 李聪:《欧盟干预科索沃民族冲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参见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④ 参见徐法言《第一次金川之役起因初探——乾隆帝绥靖川边的努力》,载《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⑤ 杨圣敏、胡鸿保:《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⑥ 陈国光:《“彝海结盟”的历史功绩及现实意义》,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⑦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版。

⑧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版。

一路收留了几个藏民,以便做行军途中与藏民之间的联络工作,团结藏民,帮助指战员学点藏语。到得荣(当时属西康省,今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名)后,贺龙向喇嘛讲解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其信任。随之,贺龙指示:“我看,为了表示友好、团结,为了方便今后的工作,叫军需处拨出一些银元和烟土,送给喇嘛头和这几个头人,作为部队驻在这里吃粮和损耗青稞的赔偿,也是我们的见面礼。前面的路还长着哩,康巴多匪,如果我们能争取这位喇嘛头派人做向导,利用头人们在当地的关系,就可以比较顺利地通过这一带藏民区。”<sup>①</sup>部队北上时,喇嘛亲自出任向导,送红军一路到甘孜(今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名)。他用藏文写了插上鸡毛的信,送到沿途各地,让藏民放行,红军因此没有受到藏人袭扰。到甘孜后,请喇嘛吃饭时,贺龙特地给一支象牙烟枪赠送给他。这名喇嘛返回得荣路过理塘(今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名)时,被国民党以通共之名杀害,但红军的威名已种在藏族人民心中。1936年5月,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率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帮助藏族人民成立波巴苏维埃政府,格达活佛被任命为政府副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交往甚密。7月,红军北上,在该地留下208名红军伤病员,格达活佛以他在宗教界的地位和声望,与各地寺庙和地方官员联系,将伤病员掩护起来,将他们分散安置在甘孜、炉霍、道孚等县,使他们痊愈。<sup>②</sup>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是十分难得的,这充分反映了早期我军指挥员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此外,解放军进军西南,也是民族学运用于军事活动的最好例证。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巴蜀途中,路过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时,就认识到在这些地区采取行动,要有大局观念,注意从政治上观察和解决问题。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接见十八军干部,部署进藏工作。邓小平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解放西藏,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政治是主要的。历史上,对藏多次用兵未果,解决的多靠政治。并提出军事与政治协同解决,政治重于军事的方针。他指示张国华军长,成立政策研究室,调查西藏的情况;要求全军学藏话,便于接近藏族人民,了解他们。邓小平的工作思路,与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十分吻合。后来,当十八军第一参谋长陈明义向他汇报筑路的情况时,邓小平又指出: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民族宗教的特点和实际出发,要调查清楚了才办事,搞不清楚的事暂不办,比乱整好。<sup>③</sup>在这种观念引导下,十八军先遣队卓有成效地积极开展民族工作,打消了藏族群众的疑虑和担心。当他们进入邓柯县时,5000多藏族群众行动起来,给部队运来柴草40多万斤,粮食8000多石,牛羊300多头,牦牛600头,牛皮口袋2500个,藏毡400床,解决了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困难。后来,为解决运输问题,甘孜藏族群众卖给了解放军14400多头健壮牦牛。这些数字都显示了民族学在军事活动中的巨大力量。

### 三、军事活动的民族学要素

民族学,是以他者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民族学是研究人的,其研究的单位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类的不同群体,即它主要研究不同人群的社会和文化特点。”<sup>④</sup>费孝通指出:“文化是什么?就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的民族经验,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准则、社会理想、生活习惯、各种制度等等。”<sup>⑤</sup>军事活动,大体上包括武装力量建设、国防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行动等方面。这些活动,莫不与文化相关联。文化渗透在军事活动的全过程和全领域。军事活动的民族学要素,不可或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军

① 叶介甫:《贺龙长征途中和藏族喇嘛头的一段情缘》,载《广东党史》2007年第1期。

② 参见王贵:《18军先遣侦察科进藏亲历记》(连载之二),载《军事历史》2006年第8期。

③ 阴法唐:《耸立在雪域高原上的历史丰碑——邓小平与西藏的解放和发展》,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④ 杨圣敏、胡鸿保:《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⑤ 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事活动中离不开以研究他者文化为己任的民族学的支持与支撑。

第一,武装力量建设。由于世界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人类的武装力量,早期始,就是多元民族所组成的。中国的武王伐纣,有很多民族的人参加;唐代军队的很多将领是少数民族。13世纪远征日本的蒙元军队有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契丹人等,内部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语言上沟通不畅,民族矛盾重重。<sup>①</sup>清初为实现全国统一,“大量征调边疆的士兵参与政府组织的军事行动”,据统计,清代,广东有士兵3703人,广西有12280人,四川有31290人,云南有10990人,贵州有14840人。<sup>②</sup>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也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成分,如第四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组织了波巴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等,组建了以藏族头人马骏为师长的独立第二师,为支援红军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在抗日战争中赫赫有名。新中国的军队里,有来自各民族的子弟,如辽宁舰官兵来自13个民族。<sup>③</sup>同时,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如此。武装力量多民族的特点,组织和实施军事活动时,必须解决各民族官兵的彼此沟通、接纳和团结问题,才能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古罗马的韦格蒂乌斯说:“临战前,务必尽量摸透将士们的心绪。”<sup>④</sup>将士们的心绪是什么?当然是对各民族文化的透彻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和谐与合作。对此,民族学能够担当责任和完成任务。

第二,国防建设。不同国家的国防,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像日本这样的海洋国家,与其他国家边界,可能以海洋某线为界,没有跨界民族问题。像韩国、朝鲜这样的陆海国家,民族单一,不存在边境的多民族问题。但大多数国家,则有不少民族跨境而居,且边境一带地区有较多少数民族居住。这就使民族学成为巩固国防的重要手段,民族团结也成为巩固国防的基本象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边境线上生活着数十个民族,仅跨境民族就达30个之多。关注民族问题,开展民族学研究,运用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推进国防建设,是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军队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所涌现出来的大批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个人,就是有力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十八军为主体的进藏部队,经历了从“进军西藏,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到“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历史演变,在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维护西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民族相互了解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统计,战争期间,西藏共出动民工3万多人次,担负抬担架、修公路、送物资和直接参战等任务。<sup>⑤</sup>可以说,国防建设与民族学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第三,军事斗争准备。军事斗争准备,是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这种准备包括战争动员、战争计划、情报准备、战备措施、军事训练、演习演练等。当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是民族地区时,民族学就应该派上用场。例如,1950年1月10日,成都刚刚解放,贺龙元帅就向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和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写了一份《康藏情况报告》,汇报他在成都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以及经过研究后提出的意见。这份报告分为五个部分,即可选择的进藏三条路线及情况分析;藏军情况和进藏使用的兵力、装备、兵种;康藏气候状况和进藏适宜季节;藏传佛教派及西藏政教合一情况;成都的藏学专家简况。该报告吸收了在成都的藏学家意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中央制定解放西藏的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贺龙元帅于1950年2月8日在西南局发言时说:“关于进军西藏问题。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对西藏情况很生疏。我曾找了一些人谈了一下。其中道士、和尚、博士、留学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一些情况,有些情况很有用。”他在这里使用了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从后来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实践来看,贺龙元帅的民族学研究是很有效的。此外,当年十八军先遣支队的饮食针对性训练,解决了陌生文化生活的适应性问题。解放军十八军先遣部队进军西

① 高小岩:《九州海底的马鞭——从民族学角度对忽必烈征日战争失利的探析》,载《江淮论坛》2011年第6期。

② 王文光、段丽波:《清代西部边疆士兵的发展与衰亡》,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③ 柳刚、王凌硕:《辽宁舰·中国舰——舰员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13个民族,来自海军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陆战队、岸防五大兵种》,载《解放军报》,2013年4月19日。

④ [古罗马]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兵法简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6页。

⑤ 张涛、李小兵:《进藏部队西藏工作政策的转变和影响》,载《军事历史》2011年第2期。

藏,生活高原化,堪称民族学理论的最好运用。先遣部队绝大部分官兵是内地人,有的怕酥油味,但为适应高原环境,捂着鼻子也要硬吃下去。于是,就向藏族群众学习酥油糌粑的吃法:用开水煮砖茶,放上盐巴,将酥油放在碗里,将有咸味的茶水倒入碗中,用手调均,慢慢地抓着吃。按此法,用新鲜酥油打出酥油茶,很香很好喝,能增强体力和耐力。<sup>①</sup>此外,为锻炼全体同志负重行军的能力,在雅安期间,每天清晨起床后,要背着约40斤重的背包、粮袋爬山。<sup>②</sup>这些举措,是基于民族学的理论而实施的。

第四,军事行动。军事行动是指根据特定具体目标需要而以武装方式实施的军事活动。与其他军事活动的区别,就在于这样的活动,有着特定的具体目标。例如,1935年,红二方面军展开南下战略行动,尽管该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却反映了红军对民族学的原理与方法的正确运用。该地区多为藏、回等少数民族,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隔阂严重,红军在该地区开展工作很困难。红军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和《藏区十要十不要》等规则,严格执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买公卖”“不住民房”“不拉夫子”“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等政策,并派干部到农村市镇,组织“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姊妹团”等群众组织,帮助藏民生产、医治疾病、开展清洁卫生工作等。<sup>③</sup>1950年1月,二野承担解放西藏任务部队建立的康藏情报站,负责收集康藏地区的政治、军事情况及风土民情等。于是,这些单位的官兵抓紧时间学习藏文,开设藏语课,每天早上学藏语一小时,很快学完了藏文拼音,学会了几句问路之类的简单用语。3月,十八军派出进藏先遣部队组建的侦察科,先行调查进军西藏的军事、政治、社会情况,提供制定政策的意见,吸收、培养藏族青年,准备藏语翻译,在藏族地区开展民族团结活动,扩大我党我军影响。<sup>④</sup>后来,十八军先遣侦察科进军甘孜,侦察藏军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做了很多政治争取工作。由此可见,遂行民族地区军事行动,民族学知识是有用的。

#### 四、军事民族学的研究范畴

藏族知名学者格勒教授在为《中国藏军》一书撰写的前言中有一段很好的论述。格勒教授写道:“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几乎每年都带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进藏,风尘仆仆地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进行人类学的野外考察。按照我们专业的要求,了解和考察一个社区首先必须熟悉当地的历史背景。为此,我们一般先要去县档案馆查阅有关的历史资料。有趣的是,每次翻阅档案卷宗时,都能发现一些早年解放军进藏时收集、整理、编撰的地方概况和历史人物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内容丰富而翔实,除介绍一个地方的面积、人口、民俗、历史等基本情况外,还有当时当地村落或部落的民兵武装情况,包括他们的枪支、马匹和土司头人小传等。每次看到这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自然爱不释手,同时从内心里不由自主地特别敬佩这些不曾留下姓名的解放军作者:不但解放了我们辽阔的藏区,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藏区各地进行辛勤的调查研究,为我们后人研究藏区社会历史留下如此之多的宝贵资料,而他们自己却一生默默无闻。”<sup>⑤</sup>读完这段话,给人至少有六个十分清晰的印象:第一,解放军进藏时很注意民族学调查;第二,解放军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是正确的;第三,解放军的民族学研究有很强的军事活动目的;第四,解放军的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第五,解放军的民族学研究内容十分广泛;第六,解放军民族学者的研究目的是纯洁而崇高的。这里已涵盖基于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的目标、价值、主体、内容、方式、方法、途径等基本问题,也为我们探索这门学问开启了思路。

第一,研究价值。民族学的领域性延伸,不能不说是广泛的。经济、政治、生态等人类社会生活

① 参见王贵《18军先遣侦察科进藏亲历记》(连载之二),载《军事历史》2006年第8期。

② 参见王贵《18军先遣侦察科进藏亲历记》(连载之二),载《军事历史》2006年第8期。

③ 朱志清:《长征中红军南下行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④ 参见王贵《18军先遣侦察科进藏亲历记》,载《军事历史》2006年第7期。

⑤ 廖立:《中国藏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1页。



的诸多领域,都有民族学的延伸触角,于是有经济民族学、政治民族学、生态民族学等学科的诞生,并得到了成长。但作为人类社会过程中地位十分突出的一个领域——军事活动却没有得到民族学的学科关注,研究基于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始终停滞不前。尽管在大量的民族学研究的选题里,把军事活动纳入其中,但很多都是基于其他领域,如政治领域,特别是政策方面来立意的,很少有从军事活动的需要来考察民族学学科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里或许有着早期民族学学科与西方殖民活动的不可言说的联系。而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似乎更多研究者与军事活动是隔绝的,而军事活动中又很少有人专注于民族学的研究工作。在我看来,这种行业的隔膜,确实是很容易导致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工作缺失的。即使有如格勒教授言说的解放军进藏的民族学研究,恐怕有的是以情报学的视角来看待的。对此,我们当然也可以解释为诸如李安宅、于式玉等民族学家的自觉行动,不过并不能说明全为他们所为。军事活动带有强力性,但民族学的工具或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强力得以软化,过程更加温和,从这一点来看,军事活动与民族学的结合并没有弱化民族学的学科地位,即民族学使军事活动更文明。所以,民族学应该关注军事活动这个领域,军事活动应该使用民族学这一工具。

第二,研究目标。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我们要承认民族学的工具性,或者说它的理论和方法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就是从民族学的核心要素来看,它也只是带给我们认识他者文化的正确方法,提高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或包容。我们很难说民族学有什么自身的用途。正因此,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是指用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释军事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他者文化现象,并试图解决异文化间的冲突和矛盾,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军事活动的目的。可以说,多民族地区的军事活动,都需要民族学研究成果。军事活动,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从客观上看,在军事活动之中使用民族学研究成果,却始终是积极的。毕竟,比起那种除了武力还是武力的野蛮,民族学的介入,军事活动总算是进步了。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在多民族地区的军事活动,民族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的研究目标。一是要了解他者文化现象,如军事活动的指挥者将要来到某一他者文化地域,为实现《孙子兵法》上讲到的“知己知彼”,他当然想知道他者到底有些什么与己不同的文化现象,做到心里有数,以便使自己的决策不脱离实际。二是要解释他者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如当军事活动的指挥者来到他者文化地域时,肯定要看见或体会到很多他者文化现象,除了勾起其为什么的疑问外,其想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这是处理与他者文化现象之间关系的重要基础。三是要处理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一般来说,到一个他者文化区域,如果事前缺乏民族学方面的训练或教育,彼此是陌生的,建立彼此的理解、信任就显得十分重要,相反就难以避免会产生异文化冲突或问题,包括言行或意识等,这些恰恰需要民族学的帮助。四是要使军事活动的所有个体被他者文化者所接纳,就需要依据民族学给出的合理理论为支撑,如进化理论、平等理论、天赋人权理论等,这里当然包括了各种科学而合理的理论,但如果利用了错误的理论,也是无益于军事活动的。同时,以上几个方面,也涉及了多民族武装力量内部的组织、指挥、管理等方面。

第三,研究内容。基于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内容有哪些?以前的一些军事活动相关人员不自觉地使用了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一些民族学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涉足了军事活动领域,这说明他们涉及了军事活动的民族学领域,尽管还没有反映学科的自觉性或学科的主动性,但这些东西仍可以归入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内容。这是因其所研究的对象、方法都属于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范畴。尽管当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尚未成为独立而成熟的学科前,其研究内容的学科指向可能是零散的。也因此我们说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有了理论的、实践的、历史的基础。考察基于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建设途径,结合军事活动的目标要素,至少有十三个方面可以归入其学科研究内容。一是民族历史。这是了解和认知军事活动区域的他者文化的首要途径,是全面熟悉军事活动区域人文环境的基本方法。二是社会面貌。这是分析和研究军事活动区域的他者文化整体状况及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状况的基本依据,为军事领导机构制定针对性的战略策略服务。三是经济状况。这是了解和掌握军事活动区域内发展状态的基本指标,是制定军事活动后勤保障计划的重要依据,如哪些需要就地保障、哪些需要后方补给等。四是文化特征。这是了解和分析军事活动区域他者



群体的思想、意识乃至心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重要方面,是开展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重要基础,特别是进行群众工作的主要依据。五是制度体系。这是了解和分析军事活动区域内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习惯等方面既有制度的重要前提,是深入把握该地他者群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面貌的突破口,是决定军事活动应该采用何种行动方法的重要参考。六是利益诉求。这是了解和掌握军事活动区域他者群体的立场、态度的重要风向标,是军事活动的行动决策需要考虑关键因素,也是判断军事活动可能的获得的支持或反对的基本指标,即如果该活动回应了他者群体的利益诉求,往往会得到该群体的拥护。七是外界交往(民族关系)。这是判断军事活动区域他者群体的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判断其对其他文化群体的态度的一个重要入口,同时还是判断军事活动本身是否可能介入当地异文化纷争的重要参考。八是内部差异。这是对军事活动区域他者文化群体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是搞清楚该群体内部情况的重要步骤,也是各项军事活动需要顾及和考虑的重要因素。九是军事特质。这是掌握和分析军事活动区域他者群体的敌对分子的抵抗意志的参考值,是评估该群体对军事活动支持或帮助可能性的重要方面。十是自然生态。这是考察和分析军事活动区域他者文化群体生存环境的重要途径,是收集和细化该区域军事行动环境数据的重要方面,是军事指挥机构制订战略战术的考量因素。十一是方法选择。这是军事指挥机构从军事活动区域他者文化群体诸多情况出发,根据军事活动目标,进行全面科学谋划,研究并制定有效的方法的复杂过程。十二是决策适应。这是基于军事活动区域他者文化群体的实际,将可能采用的方法进行模拟推演,以确定其推行的结果,从而判断该方法是否与实际环境相适应。十三是过程评估。这是在诸多的具体军事活动完成后,军事指挥机构对该活动全过程考察或评价,以判断该方法的方法是否有效等。从以上研究内容来看,方法选择、决策适应、过程评估等方面,初看起来好像与民族学无关,但其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仍然是民族学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尊重。这是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精髓。

第四,研究途径或者称之为研究方法。但研究方法,容易让人只想到诸如文献法、田野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数据统计法、逻辑推理法等,势必难以体现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以研究途径切入,则使视野拓展了许多。从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的历程来看,研究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一是军事情报侦察人员以便衣方式查阅历史文献和各类文件资料等,或以武装方式俘获敌对分子以了解情况,获取军事活动区域他者文化群体的相关信息,补充兵要地志,完善相关资料。二是由军事活动指挥员有目的地走访当地专家学者或熟悉情况者,或召集相关人员召开专题座谈会,收集军事活动区域他者文化群体的相关信息,为军事活动提供决策依据。三是以作战、侦察、组织、干部、宣传、群联、战勤等机关为主体,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调研,从不同侧面了解和掌握军事活动区域他者文化群体的相关信息,满足制定各类军事活动计划、方案、预案的实际需要。四是驻他者文化区域的部队(或分队),根据上级安排部署和实际工作需要,广泛开展他者文化群体的相关信息收集和整理活动,深入具体地域熟悉和掌握该区域他者文化群体的情况。五是军事部门内部专门的研究机构或个人,围绕特定的主题或专题,持久地深入进行研究,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等样式结合起来,并整合各类研究资源和成果,大力提升军事活动的民族学研究层次和水平。六是非军事部门的机关、机构或人员,以军事活动为目的,开展特定区域的民族学研究,直接或间接地为军事活动服务。